

伍婷婷 著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
——
基于李绍明的民族学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外借

伍婷婷 著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
——基于李绍明的民族学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基于李绍明的民族学史考察 / 伍婷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203-0799-4

I. ①多… II. ①伍… III. ①历史民族学—研究—中国 IV. ①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93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意义	(2)
二 研究回顾	(19)
三 材料、方法、概念的说明	(31)
第一章 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	(37)
第一节 社会学系里的民族学组	(40)
一 新旧华西的模样	(40)
二 华西的教育	(44)
第二节 历史学系里的民族学组	(55)
一 院系调整	(55)
二 川大的教育	(60)
第三节 西南民院研究班	(64)
第四节 新型人才的诞生	(70)
第二章 改造民族的中心工作	(79)
第一节 “在实践中去锻炼、去学习”	(79)
一 出走阿坝：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79)
二 上凉山去：四川调查组的任务	(82)
第二节 凉山的问题：社会性质之争	(88)
一 社会性质调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特性	(88)
二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	(92)

三 凉山社会性质之争	(102)
第三节 学术与政治：凉山奴隶制社会的判定	(105)
一 四川调查组的结论	(105)
二 判定凉山社会性质：从小组报告到最终结论	(112)
三 改造民族：调查中的政治任务	(124)
四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距离	(129)
第三章 少数民族的国家书写	(141)
第一节 重返阿坝：调入羌族调查组	(141)
第二节 统一国家历史中的少数民族	(149)
第三节 史志结合：一条研究少数民族的路径	(157)
一 “向苏联学习”：苏联民族学的影响	(157)
二 照搬苏联经验可以吗？	(162)
三 历史的维度	(167)
四 一种风格、两个时代	(171)
第四章 “大西南”的民族研究	(179)
第一节 旧问题的新讨论：再论社会性质与族源	(179)
一 特殊的奴隶社会：再论凉山社会性质	(182)
二 西南民族的族源：氏羌入川说	(191)
第二节 学科重建：民族学是什么	(202)
第三节 西南情结：区域研究的视野	(212)
一 理解西南	(213)
二 从“六江流域”到“藏彝走廊”	(229)
结 论	(248)
参考文献	(265)

绪 论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少数民族研究，是我回国后在成都燕大分校社会学系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延伸。现在真要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研究了，我又觉得这样安排未必妥当，因为这段时间的少数民族研究，跟先前已经大不一样。先前是我自选题目，按自己理解的方法去实施。这时呢？从教学到研究，我都成了一个更大棋盘上的棋子，要接受统一的调度。当然，从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上讲，我以前也不过是个棋子，无形中受到社会需求（还有我自身需求）的调度。但那时我还算半个下棋人，可以估量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现在社会场景大变，棋盘大变，游戏规则大变，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棋盘的哪个位置上，因此也不能选择该走哪一步了。简言之，除了教学之外，我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都是插曲。当时的彷徨迷茫难免导致现在叙述的线头零乱。我一时理不清，只好这么顺着说下去。^①

——林耀华自述

林耀华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学者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终怀着信任和乐观的心态，积极投身于民族工作和研究的新事业中。从那时起，他便称自己为民族学家。即便如此，在他的追忆里，我们仍能感

^① 林耀华：《在大学与田野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受到 1949 年后的一段时期代表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及学者所面临的一种较尴尬和被动的处境。这种处境也是留给我关于那个时代的最初印象,直到 2007 年我走进李绍明的世界。越对他进行人生史的访谈,越困惑于印象中的简单化与其人生中所呈现的复杂化间的反差。本书是试图解决如此困惑的一次努力。我也相信,这些困惑并非我个人所有。

一 研究意义

(一)“国家化”进程中的学科史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 1949 年之后大陆地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历史,重点关注的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①20 世纪初叶,以 1898 年严复译介《天演论》为起点,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中国至今百余年。百余年的学科历史涉及一种知识不断累积的过程,同时也涉及这种产生于西方特殊时代情境——殖民开拓之下的知识在中国时空内被接受和再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研究者们冠以“本土化”的名称加以讨论。^②我的理解中,学科“本土化”的内涵和意义是由两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构成的:第一,如何在保留学科、理解他者、反观自我的基础上与本土

① 本书的讨论范围设定在 1949 年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与同时代大陆地区的发展特征迥异,实有另辟专题讨论的必要,非本书内容所涉。关于台湾和香港地区 1949 年后的人类学历史的专论主要参考如李亦园:《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发展的若干趋势》,载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31—857 页;乔建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 1998 年版;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 年版;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第 5 章、第 10 章,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0—153、266—311 页;何星亮:《20 世纪下半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概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第 7 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3—178 页;哈正利:《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第 8 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关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至今不绝,集中的讨论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徐杰舜:《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社会和知识的传统相合而实现创造中国新知的可能；第二，必须看到在现代中国从传统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意味着“国家化”特征的日益明显。^①所谓“国家化”表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深刻地卷入了现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命运中，呈现出受其影响、被其改造并为其服务的诸面貌。从历史发展的后见之明看，直到今天，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个过程远未完成，事实上这一状态又与学科始终处于第二个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仅如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是否最终能实现知识的自觉取决于是否能充分理解自身“国家化”的过程，于此基础上获得反思式的启发。在这层意义上，学科史的研究极为重要。

在西方，人类学也经历了类似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国家化”进程。西方的情境下特指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同构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关于近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同时代欧洲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讨论已指出，其间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深刻影响到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和解释体系，知识的背后体现出西方文化霸权的支配地位。^②受此启发，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表明，国家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观对人类学形成学科理念、体系以及知识起到决定作用。^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人类学的特征各异^④，但“殖民主义之子”的共同身份，

① 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1页。

② [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③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73; Joh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 [挪]弗雷德里克·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王铭铭：《在中国，看西欧：人类学的国别传统》，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让人类学必须回应学科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影响学科知识生产这一命题。^① 1991年乔治·斯托金 (George Stocking) 主编的《殖民情境：民族志知识情境化论集》(*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② 一书出版，集中体现了学科史研究在该问题上的所得。书中论文通过分析不同时空内西方各国人类学学者的实践，目标在于全景式地揭开殖民情境下西方人类学形成史的面纱。

首先，人类学学者思想和行为中的殖民性。进化论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套合理解释世界文明体系的思想逻辑，是殖民扩张的思想后盾。根据进化论的理解模式，人类种族和文化统统被排列进一个以西方文明社会为最高阶段的时间谱系中。自19世纪以来，作为现代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石，进化论是一代人类学学者思想深处的印记。^③ 对此，斯托金的文章指出，早期的人类学者如马克莱 (Baron de Maclay) 对巴布亚人采取家长式的保护，反映了西方人把土著看作是弱势的、被保护的种族的进化观。^④ 库克里克 (Kuklick) 在研究了英国考古界在南部非洲的考古行动后，也同样指出，考古界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内外学说之间的摆动，均用实际研究论证了土著人是低等的、需要改造的进化观。^⑤ 进化思想被付诸于实践后，不仅产生了一大批像库贝瑞 (Kubary) 一样直接参与殖民管理的业余人类学学者，而且以默多克 (George Murdock) 为代表的众多职业人类学者也自觉地加入了殖民主义实践的队伍中。而马林诺斯基 (B. Malinowski) 虽然尽量想拉开人类学研究与殖民现实的距离，

①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73.

② George Stocking, ed.: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 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③ [美] 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0页。

④ George Stocking, "Maclay, Kubary, Malinowski: 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 62.

⑤ Henrika Kuklick, "Contested Monuments: The Politics of Archeology in South Africa",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162—165.

但无可否认,他的诸项“实用人类学”实践的背后,直接为殖民建设服务依然是一个重要目的。^①

其次,民族志知识中的殖民性。该书的前言中斯托金说道:“无论是进化论时期,还是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人类学不是提供证据证明文野之分的文明进程的合理性,就是为殖民当局的行政统治提供详实的‘他者’材料,甚至在人类学的萌芽期以及后殖民时代,人类学背后的殖民权力的影子同样挥之不散。”^②可以说,人类学的民族志既受殖民形势的制约,反过来又为殖民进程所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托马斯(David Tomas)指出,人类学家研究安达曼岛人的方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代,研究体质人类学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体质人类学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野蛮”的非欧洲人代表了人类种族进化谱系的底端,而“文明”的欧洲人则代表了最高级的进化种类。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为欧洲殖民扩张寻找到了合理的行动依据。在安达曼岛上,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经历了从体质测量,到语言调查,再到观察、访谈的一路变化,也说明了知识的更新在为不断向前推进的殖民形势服务。^③

实际上,民族志知识里的殖民特征的实质在于西方政治文化霸权对知识生产的干预。即使到了后殖民时代,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互动依然非常紧密。此时,民族志的生产与前期一样,往往随着政治的走向而变动。Saleminck 观察到,“二战”结束以后,为了极力挽回行将失去的殖民权力,法国人类学者关于越南山地民族的民族志里充满了法国对山地民族文

① George Stocking, “Maclay, Kubary, Malinowski: 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 Ira Bashkow, “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 in George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 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 48—61, pp. 170—242.

② George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s”,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 5.

③ David Tomas, “Tools of The Trade: the Production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n the Andaman Islands, 1858—1922”,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75—108.

化贡献的描述；与此同时，民族志的内容则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断发生转移。为了配合战后法国国内的需求，这时的民族志研究也充分探讨了涵化、教育、经济发展等问题。到了美国越战时期，本来就为美国军方所用的山地民族研究则转向了为反暴乱服务（counterinsurgency）。^① 同样，Bashkow 也指出，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1946 年参加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类学调查行动，事实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操控在美国海军手里。^② 通过这些阐述，这本论文集贯彻始终的观点之一为，没有所谓“纯粹”的学术存在，政治权力决定了学术的走向。看似学术争辩的话题实际上也受着殖民政治权力的左右。大津巴布韦遗址争论背后体现出的政治意图即属于这样的例子。^③ 此外，正如阿萨德（Talal Asad）所提示的，不仅民族志的内容中包含了殖民权力的影子，就连描述民族志的语言中也充斥着相当多的西方话语霸权。^④

最后，研究对象的殖民性。^⑤ 自欧洲殖民势力兴起以来，非西方族群就从未停止过与外来殖民势力的互动往来，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和文化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兴起于殖民扩张背景之下的人类学，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安放在时间的他处，就是将他们制造成静止不变的他者，使得人类学的解释力量面对诸如社会变迁的问题一度显得无能为力。何以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以往人类学家尽力屏蔽掉土著人身上的殖民性的做法，正是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Oscar Salemink, "Mois and Maquis: 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 in George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 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 274.

② Ira Bashkow, "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170—242.

③ Henrika Kuklick, "Contested Monuments: The Politics of Archeology in South Africa",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135—169.

④ 参见 Talal Asad, "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318—321.

⑤ 研究对象的“殖民性”指他们被殖民以及同殖民力量互动中产生出的一种特征或创造。

研究对象身上的殖民性又如何体现?一方面,人类学者研究的许多所谓“传统”文化不过是为殖民所用的新传统。Salemink 论及,殖民官员兼民族学者萨巴蒂埃(Sabatier)在山地民族原有的政治系统内,创造了由法国人任命的中层官员 *chefs du canton*,或是改造了固有的 *palabre du serment* 仪式,将其变成了土著首领宣誓效忠法国的仪式。^①另一方面,殖民性还通过土著人应对外界殖民挑战表现出来。Bashkow 指出,Yap 人深知与殖民者沟通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施耐德以教授他们英语来换取 Yap 的文化细节。^②同样,特纳(Terence Turner)通过对 Kayapo 人的田野考察认识到,Kayapo 人先是通过改变传统,后来又借复兴并表达传统来反抗权力间的不平衡。^③而 Feit 的研究指出,告诉美国人类学家 Speck 关于印第安“狩猎领地”(hunting ground)知识的 Temagami 首领 Aleck Paul,其实是用理想型的狩猎领地概念掺杂了诸如“法律”“权利”这样的外来概念,来维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印第安领地。^④不仅如此,土著人被殖民势力塑造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施耐德低估了 Yap 人对殖民权力的认知,未能有效处理他们夸大自己(指施耐德)身上殖民权力的举动,导致田野调查以失败告终。^⑤而特纳本人在田野过程中干脆成为了 Kayapo 人记录的对象。^⑥

① Oscar Salemink, "Mois and Maquis: 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 in George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 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 251—255.

② Ira Bashkow, "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 208.

③ Terence Turner, "Representing, Resisting,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Kayapo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291—312.

④ Harvey A. Feit, "The Construction of Algonquian Hunting Territories: Private Property as Moral Lesson, Policy Advocacy, and Ethnographic Error",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118—123.

⑤ Ira Bashkow, "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226—234.

⑥ Terence Turner, "Representing, Resisting,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Kayapo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George Stocking, ed., *Ibid*, pp. 307—312.

总之,斯托金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学思想的形成、理论和方法的创建及学科的发展,但都不能完全仅从知识累积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人类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的构建,不仅是知识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特殊社会历史情境下政治权力干预的产物。在西方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人类学知识的产生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扩张的进程。一定意义上,人类学是西方知识体系与殖民主义共谋的结果。

对人类学而言,学科史的研究犹如时间上的他者,不单为记录学科历程而设,更是为学科反观自身现状以思考未来走向提供了反思余地。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众多类似《殖民情境》这般针对20世纪人类学史的批评性研究的相继问世,让学科史研究的此番意义得到了更实在的体现。这些研究表明,理解学科历史能对未来的人类学如何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彻底使过去的权威性实践丧失了神秘色彩,而且为修正历史提供了源泉,并在现实中很好地契合了学科的实际发展方向。”^①

较之于西方学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中,王铭铭已注意到将学科史放入“国家化”进程中考虑的必要性。在系列论文中,他将学科历史的转变置于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尝试梳理学科历程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时代际遇影响学科走向、观念体系、理论方法的脉络。论述中他强调了对国家政治权力对学科的塑造力。^②但总体而言,记述了学科史上各种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因果由来,说

① [美] 乔治·马尔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尔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页。

② 王铭铭:《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载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458页;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1页。其他学者,如哈正利,也讨论了民族国家形态对中国民族学知识产生影响的问题。见其《民族学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他——中国民族学史散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成就仍是现阶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书写的主流。^① 这类写作以王建民等人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为集大成者。这本分上下卷共两册的鸿篇巨制结合文献档案、期刊、文集以及口述访谈材料,叙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清末(1903年)到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1997年)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西方和本土学者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历和教学活动,以及科研机构的创建与活动等各方面,试图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发展、重组、破坏以及恢复的历史进行整体性评述。同时,书中指出:“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绝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在研究其学科发展史时,首先必须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民族学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② 显然,王建民等人在写作时视20世纪的中国政局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生存的背景,并且亦表达政局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创立、发展,以及学术思想形成、变迁的影响力。但书中并未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① 这类学科史研究论文数量庞大,其主要成果如: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陈国强:《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周大鸣、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著作类的主要成果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揣振宇主编:《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行细致的分析，全书的侧重点仍在于总体再现学科发展的客观历程。^①

简言之，针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历程的理解尚未出现上述如西方学界分析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互动关系般的细腻研究。这直接导致我们对诸如国家权力如何规范学科发展、如何渗透于学者思想和行动、如何制约学科具体实践和学科体系等问题始终处于不甚清晰的状态。基于此，把握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仍属于学科史研究有待深入发掘之地。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回中国的场境下。之所以选择1949年之后作为分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的时段。我的考虑如下：

与研究1949年前的学科史相比，学界对1949年后的学科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科史的研究仍显薄弱。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国的高等教育全面以苏联的教育模式取代了1949年之前的欧美式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之后，思想改造的风潮席卷整个知识界，目的是肃清一切资产阶级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干扰以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作为“资产阶级学科”的代表之一，人类学被取消的命运是必然的。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出于新政权在民族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与人类学名异实同的民族学却得以短暂存在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极左化”愈演愈烈为止。这段历程直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重建时民族学和人类学分野的导火线。在最初的十余年内，民族学因为国家政治的特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学科发展甚至得到加强，国家开始推动中央到地方各层级民族院校的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研究的骨干力量，其中从延安时代发展出的民族政治学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内容。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访问、调查和研究工作就不间断地进行着。1954年的民族识别和1956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行动，民族学界老、中、青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三代学人几乎全部参与其中，成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两项民族事业。这个过程中，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识别的标准讨论、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以及简史简志的编写无一不是仅作为学术讨论的范畴存在，而是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的民族工作存在，国家政治权力对讨论话语的约束力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王铭铭所说，“倘若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处于一个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的过程中，而在同一时期，后者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文化的‘书写’……来达到本己文化的反思。”^①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学科强烈的应用特征，让这个时段可以作为理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的恰当场域。

不仅如此，若再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后的眼光看，伴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移，1949年后一度确立的研究范式已束之高阁。对于这段学科历程。学界通常会认为，因受政治话语的束缚，学科的研究传统被中断，本有的区域研究特征被统一模式化。在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式的理论指导下，学科实践逐渐走入僵化刻板的境地。因此，重建后的学科始终重视向西方学习，同时，近几年寻找并接续1949年前的学科遗产也受到了关注。^②

然而在我看来，将1949年后作为学科史讨论的飞地，这种做法潜藏的问题是需要再评估的。第一个问题是，批评1949年后的学科史需注意，批评政治权力挤压学科空间造成的各种后果与批判地看待学科历史之间事实上存在差别。前者落脚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而后者关心的是对学科遗产的反思性继承。1949年后留下的实际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仅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阶段为例。至1958年上半年，针对20个民族

① 王铭铭：《关于中国人类学——就几个问题答问者》，见其《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② 按学者的总结目前研究民国时期学科史的动向有：民国时期民族调查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研究等。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6页。

进行的初步调查,已付印出资料400万字以上,资料总数共约1500万字。这些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值得继承和超越,值得思考。第二个问题是,面对和评估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成为必须。^①事实上,这个传统对重建后学科的影响犹存。简单举一例。学科重建之时绝大多数历经时代鼎革的老一辈学者年事已高,事实上正逐渐淡出学界。重建真正依靠的中坚力量恰是一批1949年前后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学科人物。他们对学科的影响力恐怕不会因时代变迁轻易消逝。第三个问题是,若未充分而恰当地讨论这一时段,而只谈接续1949年前的学科传统,甚至直接嫁接于西方人类学的思考脉络上,对于今天学科的发展是否存在片面性,值得思考。

基于这些思考,我将以1949年后为研究时段,着重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历程,并兼及讨论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重建以来的学科史,试图探讨重建前的学科遗产如何影响着新时期的学科发展。

(二) 学科史上的“中间层”人物

关于1949年后的学科史,现有的研究取向简单而言无外两种:一种是以主要事件为顺序勾勒学科发展面貌;另一种是从学科重要人物的学术生平和思想入手述其渊源、演变和贡献等。本书的取向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学科史研究,以个人的人生为分析对象去理解1949年后的学科发展历程。严格来说,本书的研究试图对一位学者进行人类学式的学科史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an anthropologist)。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斯基开创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主张人类学的客观科学性,因而相信人类学学者作为“客观事实”的记录者,通过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能够真实地反映“他者”文化的客观面貌。半个世纪以后,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解释人

^① “社会主义新传统”一词来自学界开始系统反思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建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价值体系的影响。见刘小枫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